

身体政治视域下《七个尖角顶的宅第》的焦虑解读

李姝姻



【摘要】 霍桑在创作《七个尖角顶的宅第》时,恰逢美国西进运动和工业化发展白热化阶段。为立足于世界之林,美国快速攫取土地和财富,这一行为侧面印证了美国作为新兴国家对自身身份的焦虑。根据汉斯·凯尔森提出的国家“三要素说”,国家由人口、领土和政权构成。在身体政治理论观照下,《七个尖角顶的宅第》中受阻的基因流动、无底洞的胃口和衰老的身体等身体比喻,不仅反映人对自身生命存续的焦虑,更影射美国对于其人口、领土和政权问题的焦虑。透过身体政治的视角可见,《七个尖角顶的宅第》并非局限于小镇一角的家族历史,而是当时美国上升期民众集体的焦虑纪实。

【关键词】 《七个尖角顶的宅第》;身体政治;焦虑

《七个尖角顶的宅第》故事的主要舞台便是书名中的宅第,古宅的外观给人“一种类似人类面孔的印象:不仅由外部的日晒风吹雨淋所形成,而且也由世上的漫长岁月以及内在的兴衰浮沉所表现出来的累累痕迹而造就”(霍桑,2022:6),小说开篇就营造出一种沉重的氛围,霍桑把古宅比作饱经沧桑的人,其陈旧的外表如同人苍老的面孔。莎朗·卡梅伦(Sharon Cameron)评论道,“对于霍桑来说……房屋不仅仅是住宅,它们也是某种身体”(1981),作为“住宅的身体”,其显然承载着某种历史含义。还有学者认为,霍桑将克里福德(Clifford)和莫尔(Maule)的身体刻画为有毒的身体,从而批判美国当时排他性的政治和制度体系。(Robertson,2023)许多学者已注意到《七个尖角顶的宅第》中的身体隐喻及其历史、政治含义,但是没有对小说中的身体进行更细致的探究。身体既是一个整体,同时也由许多部分构成,具有局部性。作为一个以象征主义手法见长的作家,霍桑在小说中反复提及血液、胃口、面容等身体术语,其含义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身体政治”的概念由来已久,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习惯将人体和城邦做类比,伊索克拉底就曾将肉体 and 灵魂的关系类比为城市和政权的关系。公民是政治体的成

员,公民的健康福祉取决于城邦整体的健康。(Isocratics,1968)霍布斯《利维坦》的卷首画形象地展示了身体政治的核心,画上有一个人,身体由众多公民组成,头上戴着一个王冠(Olwig,2002),这个人的体量比国王更加庞大,超越了国王的权力,毫无疑问是拟人化的国家。中世纪史学家恩斯特·H.坎托罗维奇(Ernst H. Kantorowicz)也提出“国王二体论”的说法,即国王拥有2个身体,一个会消亡的“自然身体”和一个永恒的“政治身体”。(1955)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在其1905年出版的两卷本作品《当今强国》(*Die Grossmächte der Gegenwart*)中更为直接地指出,国家是一个准生物有机体,即一个“超个体生物”(super-individual creature)(Lemke,2011)。这些政治学家、史学家、地理学家一致认同国家(城邦)并非一个虚无的概念,而是一个有生命的实体,这个实体和其组成部分的命运息息相关。

现代的法律对国家有了更清晰的界定,1933年签署的《蒙得维的亚公约》(*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对国家的基本构成条件做了简要说明,其中第一条说明了“作为一个国际法所承认之国家应具备以下资格:(1)常住人口;(2)界定的领土;(3)政府;(4)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Scott,1934),也有法学家曾提出国家构成的“三要素说”,即国家由人口、领土和政权构成(凯尔森,1989)。换言之,人口、领土、政权构成了20世纪国家的身体。

19世纪50—60年代是霍桑创作的高峰期,当时美国成立不到100年,人口、领土和政权都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国家的身体尚未成熟,恰如未完全进化的人,用介于爬行与直立的姿态行进。有学者认为,19世纪美国社会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身份焦虑,混乱无序的身份诱发了“原始叛乱”(Doherty,1967)。《七个尖角顶的宅第》中年轻一代对老宅的“入侵”和改造,也证明了国家在焦虑状态下对于改革的迫切需求。《七个尖角顶的宅第》并非仅聚焦于老旧的宅第,更是整个美国的缩影。宅第里看似高贵纯正的血统、法官和希金斯(Higgins)无底洞的胃口、海波吉巴(Hepzibah)和法官衰老的身体,表面是在书写个体的身体焦虑,实则揭露的是整个国家的焦虑。

1. 受阻的基因流动与人口焦虑

早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国家便被生动地比作有呼吸、血液、四肢和器官的生命体。(Walters,2020)在身体政治概念下,国家是一个有机生命体,而人民是一个国家最基础的组成部分,移动的人民如同国家流动的血液。人口则是“能表现特定生物特征的生命体与其共存者的一个总合体”(Revel,2002)。《七个尖角顶的宅第》中潘钦(Pyncheon)大家族为了维持贵族血统的纯正,刻意阻断基因流动,导致道德病症和遗传病世代相传,落得人丁稀少的下场。这也是当时美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大家族为了家族利益最大化,大多奉行族内通婚,最终导致人口质量下降、数量减少,引发了人口焦虑。

霍桑的同时期作家爱伦·坡(Allan Poe)就与自己姑妈的女儿结婚,在其小说《厄舍府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中也暗示厄舍府龙凤胎的乱伦,最终二人双双毁灭。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是近亲结婚的代表。他与表妹结婚,生育了6个孩子,然而只有2个孩子顺利长大。(Randolph, 1871)虽然19世纪初还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近亲结婚的后代会更容易患遗传病,但是许多案例已预示近亲通婚对于人口质量的负面影响。

霍桑在小说中并未直接提到潘钦家族内的近亲通婚,但是从潘钦法官对其堂侄菲比(Phoebe)的觊觎看,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近亲之间结婚并不是罕事。从见到菲比的第一眼,潘钦法官就对菲比表现得过分热情,“你难道就是菲比·潘钦,我亲爱的堂兄和同学阿瑟的独生女儿?啊,现在我从你的嘴形上看出你父亲的模样来了”(霍桑,2022:109)。法官盯着菲比的嘴唇上,嘴唇本身就带有情欲的含义,法官甚至要作势亲吻菲比。菲比“出于无意,或者仅仅出于本能而与理智无关”,拒绝了法官的亲吻,“以致她那颇值尊敬的亲属身体俯过柜台,双唇向前突出,成了亲吻空气的十分尴尬的怪相。不啻是当年尼克西翁拥抱云朵故事的现代翻版”(霍桑,2022:110)。法官的亲吻也许可以用天然的亲情纽带解释,但是霍桑把他写作尼克西翁(Ixion)的翻版,显然是在讽刺他的色欲熏心。尼克西翁在希腊神话中是战神阿瑞斯(Ares)之子,被邀请到奥林匹斯山(Mount Olympus)做客,却试图引诱赫拉(Hera),也就是他的祖母,这也暗指了法官对伦理纲常的无视。菲比下意识的抗拒是有根据的,之后“法官表现出来的那种男子雄风、异性欲望,以及一些别的什么”(霍桑,2022:110)坐实了法官对于菲比的垂涎。

家族内部通婚固然能保持血统的纯正,却也后患无穷。一方面,家族的遗传病、天赋都会通过血液传给下一代,潘钦家族遗传了“导致罪行的那些弱点缺陷、不良情感、卑劣倾向和道德病症”(霍桑,2022:111),连海波吉巴自己都不禁感叹,“天哪,杰弗瑞堂兄,这二百年来,这种无情和攫取的精神一直在我们的血液中流动”(霍桑,2022:220)。和潘钦家族类似,莫尔家族每一代血液中都存在催眠的禀赋。关于遗传的物质基础,科学家早就有所臆测,但在19世纪人们对基因遗传没有明确的概念,只知道血液作为遗传媒介。直到1909年,“基因”这个概念才被正式提出。(Johannsen, 1909)另一方面,后世的科学证明近亲繁殖的后代因为缺少基因多样性,大多对疾病的抵抗力较弱。1876年,达尔文专门写了一整本书来记录植物的近交退化(Inbreeding Depression)。他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近亲繁殖的有害影响。(Spielman et al., 2004)近亲繁殖被认为是影响种群人口和性状进化的主要因素。因此,从繁殖的角度,生物学上大多鼓励基因流动,而《七个尖角顶的宅第》中基因流动是受到阻碍的,考虑到姓氏、阶级,基因始终在一个固定的小圈子内流动。

关于基因流动问题,霍尔格雷渥(Holgrave)提出了非常有洞见的看法。当他评价潘钦家族有遗传精神病时说道:“事实上,最长每隔半个世纪,一个家族就该融入广大而微贱的人群中去,将其祖先的一切全都忘却。人类的血统,为了保持其新鲜,应该在暗流中流动,如同自来水要在地下管道中传送一样。”(霍桑,2022:172)霍尔格雷渥认为血液也要随机组合才能保持健康的状态,不然就像历代潘钦家的男人,逃不开这样或那样的遗传病。第一代潘钦上校在新宅办宴会时暴毙,法官潘钦的叔叔“由于惊吓的刺激,诱发了家族遗传的严重失调性痼疾”(霍桑,2022:290),也突然死亡。法官潘钦最终也死于脑中风。霍尔格雷渥的论断和基因流动观点不谋而合,生物学表明,基因流动可以用来帮助那些濒临灭绝的物种。当一个物种存在于小种群中时,近亲繁殖的风险就会增加,而且更容易由于基因漂变而失去多样性。防止物种近亲繁殖的方式就是引入不相关的个体。(Adams et al., 2011)

故事的结尾,菲比与世仇后代霍尔格雷渥结合,这不仅代表2个家族之间的世纪大和解,还代表了不同阶级基因的重组,打破贵族阶层近亲繁殖带来的人口困境。但是基因流动远远不能缓解美国的人口焦虑,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实施优生学以调节人口数量、提升人口质量。大量生物科学实验证明了基因筛选的优势,就像阻止鸟群中有缺陷的成员繁殖,也应阻止有缺陷的人繁殖,以获得一群有天赋的人。(Galton,1892)在生物科学的理论上,教育家和优生学家拉弗林(Laughlin)提出了他的优生计划,包括2个方面:为美国本土的“不健康”人群强制绝育和以优生为基础的移民政策。他的《优生绝育法》(*Model Eugenic Sterilization Law*)规定了10类“不适生育人群”:虚弱、疯癫、犯罪、聋、盲等。(Ordovery,2003)个体血液的疾病也会导致国家的不健康,因此美国政府迫切想改变贵族的近亲繁殖现状,试图通过基因筛选培育出优质的人口。

2. 无底洞的胃口与领土焦虑

《七个尖角顶的宅第》中除了“血统”贯穿整篇小说,“胃口”也是另一大关键词,在全文中总共出现了7次。胃口和野心总是相伴而行,喀麦隆(Republic of Cameroon)学者让·弗朗索瓦·巴亚特(Jean-François Bayart)在1989年出版的《非洲国家政治》(*L'État en Afrique: La Politique du Ventre*)一书中就提到过“腹部政治”(politique du ventre)一词,华盛顿大学的林恩·托马斯(Thomas,2003)对其做了阐释,“腹部政治”指出了政治家囤积居奇、贪婪消耗物与人(资源)的倾向。“吃”和“腹部”等词语对非洲权力概念有着重要意义。英文中“appetite”不仅指食欲胃口,也可以指一个人的强烈欲望。而中文里的吞并、蚕食鲸吞、膨胀等与胃口相关的词也和领土的扩张有着紧密的联系。美国成立之初仅有13个州,面对美洲

这片新大陆,又岂能安心居于一隅。建国不到 100 年,美国下属的州增加到了 37 个^①。这种飞速的扩张也反映在《七个尖角顶的宅第》中小男孩吞噬一切的胃口和潘钦法官饕餮的食欲上。

小奈德·希金斯(Ned Higgins)吞食各种形状的姜饼,博内特(Bonnet, 2006)将其解读为悲剧是可逆转的,因为冲突、战争、物质进步、解放问题和古老的恐惧等引发焦虑的事物都被具象化为姜饼,被一个小毛孩给一口吞下。焦虑真的能通过小男孩的吞咽行为消除吗?并不然,狼吞虎咽的行为本身就是出于饥饿状态下的焦虑。小说中提到小奈德·希金斯“不啻是时间老人的翻版”,因为他不仅有着“对人和物一概吞下的胃口”,而且在吞食了众多的造物后仍保持年轻。(霍桑,2022:107)。此处小小年纪的男孩让人不由想到新生的美国,在往西吞并了许多土地之后,美国却仍是一个仅有不到 100 年的历史,处于“幼年阶段”的国家。

霍桑对于胃口的强调不仅体现在小男孩身上,还体现在法官潘钦的兽性和食欲上。人类的进步体现在动物力量的减少和精神力量的增益,而“潘钦法官还要再忍耐上一两个世纪才能去粗取精到他人的程度”(霍桑,2022:113)。法官潘钦身上还存留着原始的兽性,因此他的食欲也比一般人旺盛,他的食欲正如他对于土地的野心,妄图吞下一切。政客聚会上对于美食的瓜分也暗示欧洲各国在美洲大陆对于土地的争夺。“唉!出席聚餐是绝对太晚了!甲鱼、鲑鱼、丘鹑、煮火鸡、南方羊肉、猪肉、烧牛肉就要给吃光了,或者只有半温的土豆和凝着油腹的肥肉的这类残羹剩饭了。”(霍桑,2022:255)大片的领土如同国家的腹部,美食装满了政客的肚子,而土地也填补了美国原本空荡的腹部。

法官潘钦的野心,传承了家族的掠夺传统。“上校的性格的确可以一脉相传,颇似他本人略加淡化之后得以在人间周期性回光返照。”(霍桑,2022:18)第一代上校潘钦诬陷莫尔从事巫术活动,把莫尔家的土地据为己有。第三代潘钦为了抢夺“自家”的土地地契,任由自己的女儿爱丽丝(Alice)被巫师莫尔控制,最终失去了生命。而法官潘钦为了钱财,诬陷克里福德杀害他的叔叔,导致克里福德被监禁 30 年,并一直逼迫他说出地契的位置。法官潘钦对地契的执着也道出了 19 世纪美国对于土地所有权的焦虑,即如何把占有合法化。讽刺的是潘钦家族苦苦找寻的地契,早已失去了价值。如凡纳(Venner)大叔所说:“他们的全部土地权还不如我的农场中一个人的占地值钱哪。”(霍桑,2022:295)。土地的所有权并非永恒,在时间的冲刷下也只是泡影。

布鲁克·托马斯(Brook Thomas)指出,虽然霍桑让土地归属平民莫尔家族,而不是宣称拥有土地的贵族潘钦家族,这种方式看起来是民主的,但是也有谬误之

^① 该数据来自于 ballotpedia 中的“Territories acquired by the United States”表格。https://ballotpedia.org/United_States_territorial_acquisitions

处,因为“印第安人才是土地的原始拥有者,而不是莫尔家族”(1990)。印第安地契本身就暗含美国对印第安土地的掠夺,但是这种掠夺已经被正当化,用购买的名义掩盖了驱逐的事实。美国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在1830年签署了《印第安人迁移法案》(*Indian Removal Act*),强迫印第安人迁移到政府划定的印第安领地,印第安人部族在美国陆军和州民兵的严密监管下步行迁移,有数千人途中丧命,这一迁移之路也被称作“血泪之路”(Trail of Tears)。在《七个尖角顶的宅第》中也是如此,潘钦上校用莫尔行巫术的罪名将其送上绞架,自己则将莫尔家的土地收入囊中。这种看似正当合理的掠夺实则饱含许多人的血泪。第一代马修·莫尔(Matthew Maule)含冤而死,被送上绞架,也对潘钦家族立下诅咒“上帝将令他饮血!”(霍桑,2022:9),而他的孙子第二代马修·莫尔将仇恨发泄在爱丽丝·潘钦身上,对爱丽丝进行精神控制,最终爱丽丝饱受身心折磨而亡。

潘钦家族因为谋取土地、害人性命受到诅咒,故将家族遗传的脑溢血疾病归咎于莫尔家族的巫术和诅咒。美国人对印第安人也是如此,将其视作魔鬼的代言人,在《年轻的好男儿布朗》中,布朗(Brown)自言自语道:“在每棵树后都可能有个魔鬼似的印第安人。”(霍桑,2022:322)这种称呼不仅是对印第安人的污名化,更暴露出美国人对印第安人复仇的恐惧。潘钦家族最终还是没能在莫尔的土地上继续扎根。美国靠掠夺而来的土地权也并不长久。19世纪中叶,美国一直面临内忧外患。1846年爆发美墨战争,1817—1898年的印第安战争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美国的扩张之路并不顺利,一直在焦虑中进行。

3. 衰老的身体与政权焦虑

潘钦家族受到莫尔的诅咒,历代男主人患上了脑中风等遗传病。在身体政治中,头部至关重要,代表一个国家的元首、权力核心,头部的疾病预示着国家政权的危机。潘钦家族成员的身体不仅有疾病,而且大多处于衰老的状态。主人公海波吉巴衰老的身体正如饱经风霜的老宅,已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七个尖角顶的宅第》中老宅和外面的新世界、海波吉巴和菲比、法官潘钦和霍尔格雷渥形成鲜明的对照,揭示了美国社会正经历重新洗牌。政治上,民众期望更多的可能性,不再是一党独揽政权。老宅所有权的更迭也预示着美国内部的政局动荡和政权焦虑。

作为潘钦家族200年来的中心,老宅从新建时的门庭若市,沦落为200年后老淑女“隐居的洞穴”(霍桑,2022:36)。潘钦家族的荣耀已黯然失色,老淑女海波吉巴为了生计,不得不在老宅开起了小商店。而破旧的老宅能开起来商店吗?不仅镇上的人不屑一顾,连海波吉巴本人也完全没有信心。镇上其他人认为海波吉巴开店是“倒霉的生意”,一定会赔钱。海波吉巴也完全没有勇气踏出第一步,打开商店的门后便“逃进里间,倒进那把古老的安乐椅里,哭泣起来”(霍桑,2022:38)。

海波吉巴的哭泣不仅源于贵族身份受辱的羞耻感,更源于和外界隔绝太久之后对外部世界的恐惧。海波吉巴想象着,外面的商场商品琳琅满目,而老宅的店铺却是一片昏暗。此外,由于老宅里挥之不去的罪恶,海波吉巴的表情总是阴沉暗淡。

面对法官潘钦的逼迫,海波吉巴和克里福德终于选择了从老宅出逃,他们亲眼见到了和老宅完全不同的外部世界。他们“长时期同世界上的活动和乐趣都形同陌路之后,终于被拖进了人类生活的滚滚洪流”(霍桑,2022:237)。克里福德入狱30年,而海波吉巴几十年来也一直未离开老宅半步,他们如同新生儿一般飞速地在接收外界的信息。克里福德像是开了慧眼一般,他声称铁路注定会替代住宅和壁炉所象征的陈旧观念。(霍桑,2022:240)铁路是美国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程的一大成果,住宅和壁炉代表传统的种植园经济。南北方经济模式的矛盾冲突也是美国内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海波吉巴和克里福德的出逃象征着贵族靠压榨奴隶的种植园经济时代已经过去,代表贵族利益的统治阶级政权也岌岌可危。

除了宅内宅外的地点转换,海波吉巴和菲比一老一少的设定也显然是在指向老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海波吉巴如日薄西山,而菲比正是旭日初升。海波吉巴端详镜中的自己,已然是“一位足不出户、无客来访的年老珠黄的女士”(霍桑,2022:29)。而菲比是“那么鲜嫩”(霍桑,2022:63)。在古宅深居简出的海波吉巴也受到周围人的误解和厌恶,她的愁苦相被评价为“可以吓退撒旦本人”(霍桑,2022:44)。不同于海波吉巴的阴沉和悲观,菲比却说宅子里有花园,照料花草和在户外活动都可以让她保持健康。同样的环境下,老派的贵族们只知因循守旧,不肯屈尊贵族身份出头露面,而年轻的资产阶级却懂得在新环境中调整生存策略。菲比不仅改造了她在老宅的房间,让老宅焕发活力,还帮堂姑海波吉巴打理小卖部的生意,成了优秀的小掌柜。菲比开始帮堂姑售货之后,来光顾小商店的人络绎不绝。菲比家务做得好,会做买卖生意,还做过教师,凡纳大叔对她赞不绝口。而海波吉巴也承认菲比的这些才能不是来源于潘钦家族,而是“继承的全是她母亲的那一套”(霍桑,2022:74)。“那一套”指向的正是吃苦耐劳的新兴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靠奋斗实现阶级跃升,而不是靠继承导致阶级固化。

老宅里除了菲比这个年轻人,还有一个神秘的改革家霍尔格雷渥。在海波吉巴鼓起勇气开张商店时,霍尔格雷渥第一个来到她的商店。海波吉巴因为自己开商店给家族蒙羞而羞愤大哭,霍尔格雷渥却赞同并鼓励她的做法。“今天结束了旧时代,开始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您的血管里的生命之血已经逐渐变冷了,因为您高高在上,墨守高贵的圈子,而外部世界却在为了这样那样的必须而奋斗着。”(霍桑,2022:41)霍尔格雷渥显然是提倡民主平等的改革派,他认为“绅士淑女”这样的名号在以往的历史上有一种含义,有这种头衔的人就获得了特权。在当今——尤其是未来社会的条件下,这种头衔意味的不是特权,而是束缚。(霍桑,2022:42)19世纪初的工业化运动将美国贵族阶级拉下了神坛,资产阶级正快速崛起,靠自食其

力实现“美国梦”。阶级的壁垒逐渐被打破,有学者将结局凡纳大叔加入菲比一行人的情节解读为“一种不同阶级和平友爱相处的幻象”(尚晓进,2009),虽然阶级的融合不太实际,但至少是阶级平等意识的萌芽。即便霍桑在《七个尖角顶的宅第》中给出的结论未必圆满,尤其是对那些希望对重建社会有更清晰愿景的人来说,但他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摧毁社会阶级分类的政治可能性。(Knadler,1995)小说最后海波吉巴、克里福德、菲比、霍尔格雷渥和凡纳大叔一起奔赴新的别墅,也颇有乌托邦的意味。

霍尔格雷渥追求的不仅是身份地位的平等,他对政府也提出了怀疑,认为政府要定时经受民众的考验。“我们的议会大厦、州政府大楼、法院、市政府大楼和教堂——是否也要用石头和砖块这样的耐久材料建造?这些大建筑倒是每隔20年左右坍塌一次才好,那样就可以暗示人们检验并改良这些建筑物所象征的机构。”(霍桑,2022:171)霍尔格雷渥所说的国家机构应该每20年坍塌一次,也呼应了现实中美国两党轮流执政的制度。美国建国以来,一直是共和党(前身是民主共和党)执政,而安德鲁·杰克逊于1829年就任总统,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民主党的总统,后世给予他高度评价,认为他为美国民主带来全面繁荣。(Sellers,1958)霍尔格雷渥毫无疑问代表主张民主平等的民主党,与之相反,潘钦法官则代表老派的共和党。在共和党一家独大的情况下,选举只不过是精英的选举。如霍桑在小说里所写,“公众的呼声哪怕响如雷鸣,其实也不过是这些绅士们在今天这次聚餐会上悄声低语的回声”。精英贵族们“操纵全国大会,并就此控制全党”,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当权者。(霍桑,2022:254)代表正义公平的法官却由多行不义的潘钦担任,小说中多处体现了共和党执政下的腐败。

虽然在小说里霍桑从未直接提及政党的纷争,然而现实中他自己却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霍桑因为和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的好友关系,自动被判为民主党。1849年辉格党(Whig)在竞选中获胜后,霍桑随即失去了在海关的职位。而辉格党就是由共和党发展而来,可以推测霍桑本人对于共和党是持批判意见的。霍桑认为,“在我们这个共和制的国度里,我们社会生活时起时落的浪潮总是要把一些人置于被淹没的边缘”。共和制的社会里“世袭贵族沉沦于他的地位之下”,导致人们过分追求“虚无”的地位,迷失在对金钱、官职的追求中。(霍桑,2022:35)出于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担忧,霍桑等众多知识分子进行了乌托邦式的农场实验,试图建立人人平等且每个人都自食其力的社会。虽然霍桑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待商榷,“但他对革命思想的深刻兴趣在《福谷传奇》中得到了充分展示”(Swann,1991)。

因此,《七个尖角顶的宅第》中衰老的身体不仅反映了老贵族阶级面对新资产阶级冲击的焦虑,更隐喻美国共和党面对民主党冲击的焦虑。美国的政权面临着重构的危机,民众也渴望新的政党能带来民主平等。

4. 结语

作为一个曾有过政府任职经历的作家,霍桑的小说中不可避免地体现着他的政治思想和美国公民意识。为了避开当时严格的审查制度,霍桑只能巧妙地将场景从政府转移至老宅,将国家的焦虑改写为个人的身体焦虑。《七个尖角顶的宅第》中受阻的基因流动、对土地无法满足的胃口,以及老贵族们衰老的身体隐含的是美国建国初期的人口、领土、政权焦虑。如何消除这种焦虑,小说最后略显乌托邦的结局透露了霍桑的想法——各阶级的联合。身体的各部分只有协同运作,才能保持身体的健康。国家的各部分团结一致,将力量汇集,才能形成更强大的国家,抵御更强的风雨和挑战。

参考文献:

- 凯尔森,1989. 国际法原理[M]. 王铁崖,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 霍桑,2022. 霍桑小说全集[M]. 胡允桓,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尚晓进,2009. 改革时代与田园牧歌——谈历史语境中的《七个尖角阁的宅子》[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131-142.
- ADAMS J R, et al., 2011. Genomic sweep and potential genetic rescue during limiting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an isolated wolf population [J].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1723):3336-3344.
- BONNET M, 2006. Consuming tragedy and “the little cannibal” in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J]. American transcendental quarterly(2):481-497.
- CAMERON S, 1981. The corporeal self: Allegories of the body in Melville and Hawthorne[M].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OHERTY R W, 1967. Status anxiety and American reform:Some alternatives [J]. American quarterly(2):329-337.
- GALTON F, 1892. Hereditary genius[M]. New York:D. Appleton.
- ISOCRATICS, 1968. On peace [M]. George Norlin (ed.).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 JOHANNSEN W, 1909. Elemente der exakten Erblichkeitslehre [M]. Jena: Gustav Fischer.
- KANTOROWICZ E H, 1955. Mysteries of state:An absolutist concept and its late mediaeval origins[J].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48 (1):65-91.
- KNADLER S, 1995. Hawthorne’s genealogy of madness: *The House of Seven*

- Gables* and disciplinary individualism[J]. *American quarterly*(2):280-308.
- LEMKE T, 2011.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OLWIG K, 2002. *Landscape, nature, and the body politic* [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ORDOVER N, 2003. *American eugenics: Race, queer anatomy, and the science of nationalism*[M].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RANDOLPH S, 1871. *The domestic life of Thomas Jefferson*[M]. New York: Harper.
- REVEL J, 2002. *Le vocabulaire de Foucault*[M]. Paris :Ellipses.
- ROBERTSON E A, 2023. [In] toxic [ating] bodies: Spirits and spectral biopolitics in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EB/OL]. (2023-9-16)[2024-10-20].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ejas/20558>
- SCOTT J B, 1934.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J].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219-230.
- SELLERS C G, 1958. Andrew Jackson versus the historians[J]. *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4):615-634.
- SPIELMAN D, et al. , 2004. Does inbreeding and loss of genetic diversity decrease disease resistance? [J]. *Conservation genetics*(5):439-448.
- SWANN C, 1991. *Nathaniel Hawthorne: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Vol. 52*[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OMAS B, 1990. *Cross-examinations of law and literature: Cooper, Hawthorne, Stowe, and Melville*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OMAS L M, 2003. *Politics of the womb women, reproduction, and the state in Keny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LTERS B, 2020. *The deaths of the republic: Imagery of the body politic in Ciceronian Rom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xieties in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dy Politics

LI Shuyin

Abstract: Hawthorne wrote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at a time when the United States was in the midst of westward expansion and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In order to gain a foothold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rapidly seized land and wealth, which indirectly proves the

anxiety of a new nation about its own identity. According to Hans Kelsen's "three elements of the state" theory, a state is composed of population, territory, and government. Under the lens of the body politics theory, the metaphors of blocked gene flow, insatiable appetite, and aging bodies in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not only reflect human anxiety about the continuity of life but also allude to America's anxiety about its population, territory, and government issues. Through the lens of body politics,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is not merely a family history confined to a corner of a small town but a documentary of the anxieties of the American public during its ascendant period.

Keywords: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body politics; anxiety

作者简介:

李姝姻,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小说、浪漫主义文学研究。